

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后人类本质钩沉

董菁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反乌托邦文学将探索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因科技与工业发展而产生改变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内心。通过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后人类存在的考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由表及里地探讨了未来世界关于后人类本质的哲学命题。在本体论上提出,无论存在形式如何,后人类只要有独立自由的意志都属于人类范畴的存在;从认识的发展规律看,人类阶层存在、工具理性的无序膨胀必然导致极权统治的危机;在方法论上提出,后人类的出现只是人类在不同的路径探索未来的产物,是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想象层面的探索和对救赎的希望。

关键词:反乌托邦文学书写;后人类;身份定位;极权危机

中图分类号: I0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4)04-0090-09

0 引言

反乌托邦文学创作者们把现代社会问题趋势与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深沉思考以梦魇式的表达投射在未来想象中,20世纪末以来,反乌托邦文学探讨的主题众多,主要集中在工具理性的膨胀引起的自由价值观的异变、科技发展带来的极权操控、科技伦理等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反乌托邦文学更多地探索目光投向了因科技与工业发展而产生改变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内心。这一时期由于影视作品出众的表现力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反乌托邦的影视作品成为创作者们思想表达的主要形式,以《黑客帝国》(1999)、《黑镜》(2011)、《超体》(2014)、《攻壳特工队》(2016)、《头号玩家》(2018)等为代表的众多影视作品在赛博世界、元宇宙等虚拟的异世界中探讨后人类时代、人类形态的变化以及相对应的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自我认知和反思。这些反乌托邦的文学书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人

收稿日期:2023-02-2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二十世纪技术悲观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当代科幻反乌托邦文学比较诗学研究”(2020SJA18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菁,女,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董菁.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后人类本质钩沉[J].外国语文,2024(4):90-98.

类看似天经地义的主体性地位即将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模糊,一直以来的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主流地位被质疑、批驳,人类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被科技的洪流冲刷得岌岌可危,需要重新探讨和定义。

1 “后人类”的概念辨析

近 30 年的时间里,“后人类”(Posthuman)一词逐渐进入各个领域和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后人类意味着超越了人类现有的身体机能。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对人类及周边环境的不断介入,促使人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凯瑟琳·海勒(2017:44)指出:“我把人类和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她认为,只要有技术对人类的介入,无论是否直接作用在人体上,是否改变了人的生物特性,都可以认定为后人类。她特别肯定了人工智能与后人类形态的密切联系,并对后人类范畴进行了界定。佩普勒尔(Pepperell, 2003: 187)在《后人类状况:意识超越大脑》(*The Posthuman Condition: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Brain*)中指出,后人类主义者把自己当作是技术世界的一种存在式外延。这里的“技术世界”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一系列可以改变人类存在形式的技术领域。尼克·博斯托罗姆(Nick Bostrom, 2004: 236)也肯定了后人类和后人类时代是将来可能达到的一种文明,一种技术上高度发达的时代。后人类在这个时期将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更强的体力以及更长的生命。这样看来,后人类时代颇令人向往。

凯瑟琳·海勒(2017:152)指出,目前十分之一的人类已经属于后人类的范畴。实际上,各种生物科技、仿生科技、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普通人佩戴的眼镜、耳聋患者的人工耳蜗、断肢患者的义肢等都是现实世界已经融入普罗大众的辅助身体器官运行、增强身体各项机能的科学技术。人类早已突破了通过科学技术来改造人体的边界,DNA 计算与存储、数字细胞、半导体-生物混合系统等新科技发展领域、方向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20 年 8 月,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举行现场直播,表示脑机接口(Neuralink)装置的实验已经成功,即将开展人体实验,即建立一个人的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双线接口,此后,计算机可以从人的大脑中输入和输出信息(凤凰网,2020-08-29)。后人类的存在,混淆了人与非人的界限。唐娜·哈拉维(2016:208-213)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后人类时代的三个重要边界的崩塌: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分、动物—人类与机械之间的区分、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区分。简而言之,后人类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的结果,无论是生物技术或者电子机械,还是其他的科技种类,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人类身体功能,追求突破身体桎梏的自由。

2 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后人类存在图景

虽说后人类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但现实中的后人类只是部分学者的界定,并未形成共识,康德(2013:97)认为:“一切显象都在时间中,无论是同时存在还是相继,都只有在作为基底(作为内直观的持久形式)的时间中才能被表象。”我们无法研究现实中的后人类的零碎、初步的显像,所以只有在建立于无序真实生活中的有某种严密的逻辑的想象中寻找后人类存在的表象,这种“想象”主要指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反乌托邦文学书写。我们把反乌托邦文学作为研究的工具,不仅是要努力地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而且要以此重构对社会的理解,解释纷繁复杂的后人类存在的疑惑。从根本上说,后人类的存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从技术分类的层面上把后人类主要分为两大类:生物技术改造人和电子机械改造人,即赛博格。

众所周知,生物技术作为20世纪发展最快的尖端科技领域之一,是人类科技史上无可辩驳的重大成就,生物技术日新月异,已然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生物技术的发展颠覆性地改变了众多相关领域的结构,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甚至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但伴随而来的伦理与安全、负外部性等问题也一直是全人类担忧和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y)的《弗兰肯斯坦》(1823)开始,在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人类的自然状态、创造完美人类的科学家们努力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过。威尔斯(H. G. Wells)的《莫罗博士的岛》(1896)中博士对兽和人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和更为惨无人道的“人性化”改造的兽人;《羚羊与秧鸡》(2004)中独自存活在末世中完美不懂世事的“秧鸡人”……都是生物技术改造人类的畸形产物。

生物技术发展的另一个特殊的种类就是克隆人,和生物技术改造人不同的是克隆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和人类是一样的,和人类一样具有相同生理结构并能自然地生成思想意识,那么他们是“人”还是“非人”?如何给克隆人定位?人类制造克隆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参加战争,克隆人处在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的复制人就是这样奴隶般的存在。二是人类需要从他们身上提取器官,以此为目的的克隆人如圈养的牛羊牲口,是被人类消费的商品。罗维克(D. M. Rorvik)《人的复制》(1978)、《逃出克隆岛》(2005)中的克隆人就是这种被圈养的待宰羔羊。

早在1985年,哈拉维(Donna Haraway)就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提到“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Cyborg”一词,由“Cybernetic”和“Organism”合成而来,意为受控机体,人与机器的结合体。她认为身处20世纪晚期,在这个神话般的时代,我们都是“喀迈拉”(Chimeras),意为这个时代的人类都是被制造、组装、

装配出来的机器与有机物的嵌合体(哈拉维,2016:206)。在这一后人类的表现形式中,后人类已经摆脱了纯粹血与肉的生物构成,把有机体与无机体——机械地结合起来了,这也是人类拓展自己作为生物的又一思路,摒弃达尔文的进化论,要以自己的力量战胜进化洪流的另外一条道路。

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包含三个维度的结合:一是利用机器作为人类实现具身目的的外延工具。目前,除了帮助残疾人正常生活的义肢、人工耳蜗等机械电子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备,当这些日常所需也被植入身体,第一个维度的赛博格就呈现出了普及化的样态。二是直接通过电子机械技术改造人体。早在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西方传统哲学的身心分离二元论。他认为人的身体和意识是可以分离的,虽然他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人的身体结构、本体大加赞赏,他指出人的身体由上帝创造,任何人造的机器都无法与其相比(笛卡尔,1959:7)。但这样的人本主义的理念在当时确实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然而,笛卡尔的论述在后人类时代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不仅残障的身体装上义肢以行动自如,失明的人类可以在大脑中安装计算机芯片透过摄影机传递视觉信号,身患绝症的病人甚至可以用人造器官替换掉损坏的内脏。《攻壳特工队》中的义体人就是典型的第二个维度的赛博格,电影中是一个义体盛行的世界,人们更换肢体、器官以达到具身的目的,主人公素子除了大脑都是由电子机械组成。达成赛博格的超级人类特质是人类追求自我机械化的主要目的。三是人的虚拟化身。《雪崩》(1992)中对虚拟世界以及虚拟替身的想象使人类第一次接触元宇宙这个概念。书中,互联网是与现实世界有着高度联系的三维空间世界,人们通过“化身”把意识投放到这个仿真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娱乐和社交。简圣宇认为在探讨赛博格的人机结合维度时,“不能仅聚焦于身体本身,还应关注身体向外延展的部分——‘身体存在’场域的变化”(简圣宇,2020:91)。当人类存在的场域由单一的“现实场域”延伸到“虚拟现实”场域,人的身体由以往的单数形式变成了复数形式,那么,人的虚拟化身就是第三个维度的赛博格,是否也是人类,或者理解为后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其实这样的世界已经成为现实,游戏世界的化身存在,疫情期间的在线会议、在线办公、在线教学等都是虚拟化身的技术应用。有学者认为在元宇宙的世界里,人的身体的概念不再单纯指向自然的肉身形态、物理形态,人的身体因为化身的存在,打破本体论调,转向感知和经验层面,出现了多重的化身,如“离场身体”“虚拟身体”“隐性身体”(周敏等,2022:29-34)。《黑客帝国》里,人类躺在营养液里,靠数字化的意识生存,就是“身体离场”,而意识通过“虚拟身体”穿梭在虚拟世界中。

3 本体论层面:后人类是否是人类

在哲学上,本体论追问世界的本原,回答存在什么、是什么样的、其组成要素以及要素

之间的关系,即是什么的问题。“后人类是否是人类”的命题即围绕后人类本体论的认识展开,“我是什么”“我是谁”在很多的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都会反复触及这样的命题,身份定位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后人类的难点。他们是人类吗?什么决定他们是人类与否?科学技术拓展了人类身体的维度,身体被分为控制意识的大脑和其他身体部分,其实这种区分、这种把身体和意识分开的哲学基础源于西方文化与哲学在天人关系上的主客二分思想。西方文化在自身的认识上主张灵肉分离,从基督教的拯救人类就是拯救人的灵魂开始,关注个人的精神生命的人本位思想就成了西方人学的价值理想。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说认为每个人都由身体和心灵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组成。身体与心灵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灵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因此存在一个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里只存在心灵。笛卡尔认为“人的主要的完美之点,就在于他能按意志自由行动”(笛卡尔,1959:14)。如果说赛博格在第一种机器外延和第二种人机结合维度,对自我的认知是人类,那么第三种虚拟化身维度的人类本体的认知就是独立意志主体性的体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肯定了“人能借意志自由动作”是“一种高度的完美性质”(笛卡尔,1959:14)。无论身体是否受到了干预和转变,关键的是主体性的建构没有改变,独立的自我意志的存在,而不是非原生、非生物成分的存在。正如《攻壳特工队》的主人公,全身义体化,唯一能被定义为人类的理由,就是她依然拥有自己的“Ghost”。

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提出把自己下载到电脑网络中,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不朽和永生。这种主张将主体的自由特权扩张到后人类领域,试图超越本体论的基础,把后人类的身和心完全割裂。值得关注的是,自由意志并不是自由人本主义层面上的自由,试想一下,如果身体可以随意被替换,只保留纯粹的精神意识,那么在后人类时代,地球上是否仅剩理性的幽灵盘旋游荡?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美丽新世界》(1931)的世界里没有疾病、没有灾难、没有沮丧、没有孤独、没有家庭,甚至没有强权,因为不需要。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景象错了,错哪儿了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样世界中的人已经不是人类,因为“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他们的世界如此不自然,因为人性已经被改变”(福山,2017:9)。“人人都健康愉悦的活着,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福山,2017:217)。说到底,他们没有了情感,没有了欲望,没有了自由意志,这些消失的正是人性最显著的特点。人们追求技术,希望借技术之手强化自身,在要求技术抹杀死亡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和意义感(袁欣悦等,2022:07)。华裔小说家刘宇昆在他的短篇小说《奇点遗民》中探讨了是否有人能抵挡抛弃肉身去做数字永生人的诱惑。作者借主人公的妈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造就了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让行为拥有意义。”(刘宇昆,2017:72)相对于永生,死亡对于人类的意义在于正是死亡节点的存在,才让人类意识到生

命的可贵性和紧迫性,才能让人类拥有不断认知、顺应、挑战甚至征服的欲望,这欲望和福山所指的“人性”异曲同工。

萨特(1987:8-10)指出“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萨特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他认为人能够通过理性意志而自由选择成为某种存在,并在这一未竟的过程中创造了自身的活动进而规定为他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独立的意识存在,并有自由选择的意向的后人类,无论这个生命体的存在形式如何,是“兽人”还是“克隆人”“赛博格”,都是人类范畴的存在。

4 认识论层面:后人类时代的极权危机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本质和产生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认识论聚焦于认识本体的过程,回答如何认识社会本体及可能的认识方式。后人类的认识论回答了从何种路径认识后人类及发展规律的问题。最初,启蒙思想家们强调个人通过自由意志来实现对于现实存在层面的束缚和超越,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无论从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还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1627)、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的《太阳城》(1602)中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乌托邦书写中描绘的是一个完全受理性支配、精心设计的社会制度和人们普遍和谐幸福的完美蓝图。然而随着启蒙思想成果的自由价值观落到现实层面,人们发现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未得到全面解决,人的自由、平等也未真正实现,与此相反,出现了更多的不合理的现象。赫胥黎(Huxley, 1958:2)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道:“即使在那些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自由精神,甚至是对自由的渴慕之情,似乎也正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在这些理想国和完美蓝图之下,工具理性的无限度抬升,人成了国家机器运转的工具,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差别性被弱化了,个人的特殊性被抹杀,随之而来的是事物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价值的多维性被统一覆盖,个体的话语权和平等性被否认了。如果《我们》《1984》等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理性世界的描写没有显示出恐怖的一面,我们可以从那样的极权社会中普通民众普遍的压抑、阴郁的心理管中窥豹,无限制的理性必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导致极权的泛滥,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而引发的自由价值观的异变最终导致极权统治危机的到来。

极权统治的危机实际上已经覆盖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反乌托邦文学书写。社会层级之间的距离越大,越容易造成极权统治。后人类时代,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同层级之间的距离如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突然拉大,面对突如其来的权力溢出,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警告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福山,2017:101)。他认为人性和人权、正义及道德等息息相关,而生物技术的成本——收益的功利性计算会导致人类诞生以

来的道德观终极阵地的丧失。可笑的是人创造出的“怪物”越来越显现出“人性”，弗兰肯斯坦的毁灭源于他人类性质的情感，身体的无可匹敌也不能代替内心的孤独，想要得到认同和陪伴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类认识的本质和结构造成的，克隆人和人类一样的生理、心理结构代表着他们和人类一样也拥有人性，有求生的本能，有追求、抗争的意愿，这也必将造成人与克隆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局面。与这些“怪物”相反，创作出他们的原装的人类却越来越没有“人性”了，技术层面的成功让他们自比上帝。《莫罗博士的岛》中的博士自感创造了“兽人”就可以操控一切，无视他们的感受和诉求对他们进行高压独裁统治。《羚羊与秧鸡》中的世界崇尚理性科技，科学家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转基因，创造各种生命，如十二条腿的无头鸡、没有大脑只有肥大器官的器官猪、外表和善实际阴险凶狠的狗狼等。片面的极度追求工具理性释放出了人性里的恶：极端的操控欲。正如“秧鸡”所说：“最近可是忙坏了——创造动物简直太好玩了，它让你感觉就像上帝。”（阿特伍德，2004：51）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这些表现都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产物，在这里人被异化、物化，极权统治应运而生。

更惊悚的是后人类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合谋，电影《乐园追放》（2014）里大部分人类抛弃了肉体，在虚拟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分配到的计算能力不平等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交互性决定了阶层的产生，有了阶层必定有统治和被统治，阶层距离大就导致极权。即使把人的意识上传到网上，自然社会中的乌托邦上传到网上仍然是乌托邦，反乌托邦上传到网上依然是反乌托邦，元宇宙只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不是逃避的空间，也不是新世界。改变人类社会构成的不是技术，是人类自身。无论人类是血肉组成的有机体、是碳基生命还是基于电子机械、基于数字计算，只要人类阶层存在，工具理性没有被有效地限制，认识发生发展的规律没有改变，人类社会极权统治的危机一直迫在眉睫或者已然降临。

5 方法论层面：后人类是灭绝还是救赎

方法论着眼于我们获得认识的方法，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后人类就是探索未来的客体存在。“to be or not to be”这个主题在文学史上是个永恒的话题，在很多反乌托邦文学书写里包括现代很多学者的预言中，人类都将被淘汰，被替代，被毁灭。《羚羊与秧鸡》中，由于对现实世界的绝望和仇恨，“秧鸡”力图毁灭地球上的人类，代之以他所创造的“人造人”。人造病毒迅速蔓延，人类几乎灭绝，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系列电影《终结者》中，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核战争毁灭了人类世界，虽说还有人类的抵抗者存在，影片中的机器人都是比人类更聪明、更强悍、更有执行力的存在。那么人类是否要“加入恐龙的队伍，成为曾经统治地球但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物种”（海勒，2017：

383)。福山认为与后人类相比,人类注定会被淘汰;生命伦理学家乔治·安纳斯(George Annas)等人认为:对人类进行“可遗传的基因改造”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波斯特洛姆,2021:128)。当然,更多的学者对后人类时代的到来持乐观的态度,罗西·布拉伊多蒂(2016:294)在《后人类》中明确提出她把后人类的新形态看成是一个能自由选择自己存在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神奇机遇”,是一个释放人类天性、重新定义自己的“独特机会”。凯瑟琳·海勒(2017:385)认为后人类唤起了“摆脱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人类存在意义的“令人振奋的前景”。

关于后人类是人类的灭绝还是救赎的问题,不能被反乌托邦文学书写里的末世图景误导,也不应该人云亦云,可以从方法论出发,在探索载体、探索路径及探索本质三个方面来分析。通过反乌托邦文学书写这一载体来审视后人类的存在本质,要注意的是反乌托邦文学书写是具有鲜明的现实干预与介入特质的文学类型,它以梦魇式的未来想象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政治问题与人的存在和未来命运的深沉思考。自然科学的学者们通过科学技术来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学者们也从文学、哲学、政治等角度不断探索人类的未来图景。反乌托邦,“反”的是乌托邦理想国构建中的悖谬与不切实际,“反”的是乌托邦中崇尚专权、抹平个性、片面强调技术的无序发展和趋势(林可,2020:74)。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后人类时代的种种,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针对现实表象导演的一出不加干预情况下的极端戏码,是他们对于现实发展中的种种潜在的可能性表示出来沉重的忧虑和思考,他们高举警惕的大旗,以超验的视角展现了极端发展后的末日图景。每一个反乌托邦写作中都体现了对于世界、社会、人的内心的深入思考,这也是人类对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想象层面的探索。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改造人体甚至想要创造完美人类的目的是摆脱疾病、痛苦,摆脱人类身体的限制和桎梏,去迎接更加完美的人生、更加艰辛的挑战。从猿人开始学会使用工具逐渐向智人的进化开始,人类一直就在探索不断强化自身的方法和路径。为了抵御寒冷借助植物、兽皮遮体;为了捕食猎物发明了弓箭和渔网;为了探索更远的地域,发明了舟船等交通工具。人类之前的探索主要走的是利用环境、借助工具、发展外在助力的宏观可视路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便捷有效的具身方式开始进入人类视野,通过科学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成为后人类,可以拥有更加强健的身体,可以拥有更加卓越的能力,更加绵长的寿命等。后人类的出现表明人类强化自身的方法已经在外在的借用他者的路径之外开辟出一条对内改造自身组成的微观虚拟化路径。虽然探索的方向不同,探索的目的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探索是人性的应然表现,这是由人类本能的好奇心和欲望组成。好奇心和欲望是人性的自然本能,从生命最初的伊甸园开始,人性的欲望与好奇心,就不会被乌托邦下的自我意识所禁锢。没有探索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人类探索的脚步就如

圆的成长,已探索的面积越多,这个圆的边界越大,未知的接触面越大,因此人类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本质对未知的渴求导致人类探索的脚步将永不停歇,后人类的出现也是人类不断探索的应然。

参考文献:

- Huxley, Aldous. 1958.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M]. New York: Harper & Row.
- Pepperell, Robert. 2003.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Brain* [M]. Bristol: Intellect Books.
- 笛卡尔. 1959. 哲学原理 [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弗朗西斯·福山. 2017.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M]. 黄立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简圣宇. 2020. “赛博格”与“元宇宙”: 虚拟现实语境下的“身体存在”问题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91-103.
- 康德. 2013. 纯粹理性批判 [M] // 康德著作全集: 第2版第3卷. 李秋零,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凯瑟琳·海勒. 2017.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可. 2020. 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反”之体现 [J]. 青年文学家 (30): 74-78.
- 罗西·布拉伊多蒂. 2016. 后人类 [M]. 宋根成,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刘宇昆. 2017. 奇点遗民 [M]. 耿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2004. 羚羊与秧鸡 [M]. 韦清琦, 袁霞,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马斯克展示脑机接口. 凤凰网 [EB/OL]. (2020-8-29). <https://news.ifeng.com/c/7zK8pmd2ILU>.
- 尼克·波斯特洛姆. 2021. 超人类主义思想史 [J]. 孙云霏, 王峰, 译.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4): 107-129.
- 尼克·博斯托罗姆. 2004. 生存的风险——人类灭绝的场景及灾难之分析 [G] // 曹荣湘. 后人类文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萨特. 1987. 存在与虚无 [M]. 陈宣良,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唐娜·哈拉维. 2016.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M]. 陈静, 吴义诚,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 袁欣悦, 尚必武. 2022.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技术与人类 [J]. 外国语文 (5): 1-8.
- 周敏, 周高尖. 2022. 元宇宙生态下影游融合电视剧游戏化空间创作研究 [J]. 当代电影 (9): 29-34.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Posthuman Nature in Dystopian Literature

DONG Ji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Information Revolution, dystopian literature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n people's social formations and the human min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ortrayal of posthumans in dystopian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20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posthuman in the futur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ntologically, posthuman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human beings as long as they have independent free will regardless of the form of ex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the disordered expansion of human stratum existenc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crisis of totalitarian rule.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emergence of posthumans is merely a product of human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in imagination in dystopian literature and the hope for redemption.

Key words: dystopian literature; posthumans; identification; totalitarian crisis

责任编辑:冯革